

国外关于经济增长的政治学研究综述

□高 飞¹ 罗湘衡²

(1.重庆市黔江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重庆 409099 2.南开大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天津 300071)

摘 要:本文运用文献分析法,从政策选择与政治条件两个维度来梳理国外关于经济增长的政治学理论,并在各维度内对已有文献的观点进行分类归纳。结合文献梳理的成果,笔者提出关于经济增长的政治学研究范式的一些思考。

关键词:经济增长;政策选择;政治条件

经济增长(economic growth)是宏观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也是国外政治学所关注的重点。一方面,学者探寻经济增长对政治发展的影响,以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关于经济增长对社会稳定影响的研究最为著名,^[1]此外西摩·李普塞特(Seymour Lipset)分析了经济增长对民主的影响。^[2]另一方面,学者研究导致经济增长的政治因素。本文主要对后者加以梳理。

国外政治学主要从政策选择与政治条件两个维度来研究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的政策选择是指国家(state)^①采取特定经济政策的行为,该类研究通常按照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思路展开。经济增长的政治条件是指经济增长所需要的经济体系正常运行的政治环境。研究者通常假定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此国家要尽可能少地参与经济活动。从这一逻辑出发,学者探寻哪些政治条件符合这一要求。这两个维度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强调探寻经济政策主体的行为,而后者强调寻找经济自由运行的政治环境。

一、经济增长的政策选择理论

从1973年石油危机开始,主要资本主义工业国遭受了持续的经济危机。针对危机,学术界研究的一大问题是在相互依赖和不完全竞争的世界经济中,如何才能实现成功的经济表现。20世纪80年代中期,西方出现了大量关于该问题的著作,^[3]

这些著作的最大特点是从国内政治经济结构去解释宏观经济表现,最主要的切入点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国外对经济增长的政治学研究也基本从这一视角来探讨国家的政策选择。代表人物及其理论是曼库·奥尔森(Mancur Olson)的集体选择理论、罗伯特·贝茨(Robert Bates)的理性选择理论、彼得·卡岑斯坦(Peter J. Katzenstein)的统合主义理论以及发展型国家理论。

(一)集体选择理论

多元社会的政治是利益集团的政治。利益集团是个人与国家的中介,而国家的“公共政策是多数利益集团寻求进入公共权力的相对平衡的结果”^[4]。因此在现代社会中,利益集团对国家的政策选择具有重要作用。奥尔森通过对利益集团规模和策略的研究来分析一国的经济增长。

奥尔森认为诸如工会、雇工协会等利益集团存在的目的是满足成员的物质需求。为此利益集团通常采取两种策略:集体获益策略(strategy of collective gain)与再分配策略(strategy of redistribution)。集体获益策略是指利益集团通过努力增加社会整体财富,进而在固定的分配比例下,其成员的绝对收益也得到提高,即“做大蛋糕”的策略。再分配策略是指利益集团不考虑其集体行为对社会财富整体增长所带来的影响,只考虑当下所占份额的相对比例。奥尔森认为在一般情况下理性的利益集团都会采取再分配策略。^[5]假如社

收稿日期:2011-12-25

作者简介:高飞(1984-),男,重庆市黔江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科长,博士;罗湘衡(1984-),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2009级博士研究生。

①本文的“国家”是指,在国内层面与社会相对的、合法拥有暴力的政府或政权机构。

会充斥类似采取再分配策略的集团,那么经济增长就达不到最优状态。^[64]因此,以社会为中心研究范式的最大特征就是在一国内部寻找一个分利集团(distributional coalition)。比如有学者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只有分配性联盟处于弱势,经济才会出现稳定增长。^[7]

那么如何才能实现经济增长呢?奥尔森认为利益集团要有涵盖性(encompassing)。涵盖性集团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是:“涵盖性组织拥有大部分社会成员,这些成员拥有一个重要的激励,即积极关注生产……涵盖性组织如果有一个理性的领导层,那么在对待再分配政策中的税负问题上会保持谨慎态度,并出于自利而最大限度地减少税负。”^[64]低税率对投资形成一种激励,进而推动经济发展。^{[8]567-576}

集体选择理论是以社会为中心来解释经济增长的典型代表。奥尔森从理性人假设出发,用集团规模作为自变量来解释经济增长,在形式上其逻辑几乎没有什么问题。^[9]然而,集体选择理论遭到猛烈抨击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忽视国家。^{[10]792-827}在奥尔森看来,国家仅仅是集团竞争的场所,是利益集团获利的工具。他忽略了国家在政策选择过程中的自主性,如果国家具有自主性,那么即使利益集团具有涵盖性,国家的最终政策也未必与利益集团的需求相一致。

(二)理性选择理论

在国家与经济的关系上,国家行为通常被认为符合经济逻辑,国家通过宏观经济政策来烫平经济波动与经济周期,而构建制度也是为了减少交易成本、保护产权。罗伯特·贝茨将理性人假设由社会中的个人运用到官员身上,推进了对制度的认识。

贝茨研究了肯尼亚经济增长。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肯尼亚的经济增长是市场的作用,认为制度对一个交易费用为正的世界起作用。一旦产权制度建立,市场就可以有效分配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因此经济决策就能由市场做出。贝茨却不这样认为,他主张政治“决定了有效率的结果得以实现的程度”,也“能影响经济收益的分配”^[11]。制度的功能不单是减少交易成本,“制度有助于决定何种经济利益成为政治上的有效利益,从而决定了谁的财富才能在经济秩序中得到制度化保障”。因

此,“何种集团在政治上能够组织起来,并获取界定产权体系的权力,这就成了非常关键的问题。”^[11]贝茨的理性选择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并非市场、制度的作用,这一理论超越了传统制度经济学对制度的认识:制度是由掌握权力的人或社会集团来构建的,其目的只是为了利益分配。而促进财富增加根本就没有在制度构建者的考虑范围之内,经济增长只是附带出现的结果。

表1 贝茨与制度经济学对制度的认识差异

	产生	作用	理论意义
贝茨视野中的制度	权力	利益分配	制度构建背后的政治意义
制度经济学视野中的制度	人的知识和经验	规范人类行为、界定经济中的激励结构	将交易成本与新古典理论结合起来

(三)统合主义理论

统合主义(corporatism)^①跨越了国家与社会的界限,分析视角没有单纯停留在社会层面,而是分析国家与社会间的互动。彼得·卡岑斯坦是最具代表性的将统合主义运用到研究经济增长的学者。

彼得·卡岑斯坦通过对国家与社会的合作来分析小国的经济增长。通过研究7个欧洲高收入小国,卡岑斯坦发现它们都采取了一种模式——民主统合主义(democratic corporatism)。民主统合主义是一种利益集团调停的模式,它具有以下特点:“利益集团相对集权与集中;通过利益集团、国家官僚与政党间持续的政治协商来实现对冲突目标的自愿和非正式协调”^{[12]32},他认为这些欧洲小国之所以能在国际市场的变化中生存并实现经济增长,是因为政治行为体在经济变化牺牲者的补偿问题上达成了全国性共识,并保持了对经济变化的弹性调整。^{[12]32}卡岑斯坦指出,虽然“自由统合主义”的瑞士与“社会统合主义”的奥地利具有不同的国家结构,但是国家与社会集团合作的政策过程是一样的,瑞士与奥地利分别采用私有经济机构和公共基金来补偿经济变化的牺牲者。

统合主义国家具有自主性,它需要与社会利益集团进行协调以寻找发展经济的共识,同时国家能力也有强弱之分。虽然卡岑斯坦通过比较历史案例解决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统合关系如何实现政治经济成功,但是他没有回答国家实行这

①国内学者通常对 corporatism 的译法主要有三种:“统合主义”、“合作主义”和“法团主义”。三种译法都有其合理性。“法团主义”主要强调参与政治的各社会集团的合法性团体性质;“合作主义”强调相对于英美“竞争性”自由主义政治实践的区别;“统合主义”强调国家和政府在国家与社会合作中的主动作用。

种统合关系的原因何在。卡岑斯坦在《统合主义与变化》中引用了戴维·兰德斯(David Landes)的观点,工业调整必须既要被理解为“经济现象,也要理解为文化、社会现象”^[13]。瑞士与奥地利成功解决政治和经济冲突的统合主义方式加强了共识重要性的信念,“一个宽泛的自利概念强化了国家的政治稳定与经济灵活性”^[14]。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卡岑斯坦认为国家实行统合主义政策的原因是历史形成的、社会集团共享的共识协商文化,而非某种结构性因素。统合主义国家通过有组织的社会合作来解决经济、政治等结构性问题,这有利于形成符合国内外形势的弹性经济政策,维护政治稳定,避免由于经济波动而导致社会动荡。他虽然在理论上没有探寻国家与社会合作的动机,但是搭建了国家与社会间关系的桥梁,此后的发展型国家理论在解释东亚经济增长时沿袭了这一思路。

(四)发展型国家理论

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理论也强调国家与社会的合作,强调国家安全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国家、尤其是经济发展部门通过制定与执行战略性产业政策来推动经济增长。它具有以下四大特点:第一,持续的发展意愿;第二,具有高度自主性的核心经济官僚机构;第三,紧密的政商合作;第四,有选择的产业政策。^[15]

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是“资本主义发展型国家”(capitalist developmental state)这一概念的缔造者^[16],他在《通商产业省与日本奇迹》一书中构建了一个关于国家干预的韦伯式理想类型,即日本是一个既非社会主义也非自由市场的发展型国家。约翰逊认为,日本的经济增长不在于市场力量、管理技术或者独特的文化特征,核心是“计划理性的关键国家”^[17]。日本将经济增长列为最为优先考虑的目标,为实现该目标,一个涵盖小规模经济精英的“领航机构”(pilot agency)制定理想的战略性产业政策,并在平衡计划优势与市场效率的过程中加以执行。

发展型国家通常选择若干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进行集中发展,比如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前期集中力量发展电力、造船、钢铁与煤炭等基础产业,到50年代后期又向新兴产业扩展,于是汽车、家电、电子与机械制造业迅速崛起。罗伯特·韦德(Robert Wade)认为东亚经济体的超级经济表现源于政府在某些关键产业上的集中投资。政府通过资本积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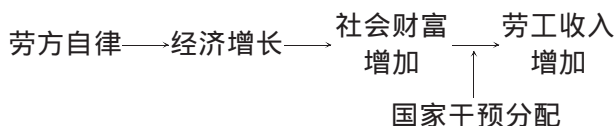
故意运用政策将市场价格“弄错”,并运用非价格手段来修正市场机制,促使国家在特定产业密集投资并确保新技术迅速转移到实际生产面。^[18]

二、经济增长的政治条件理论

从政治条件维度研究经济增长的国外学者主要探寻政府派性、政权类型、政治稳定、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一)政府派性与经济增长

在资本主义阶级关系中,劳资矛盾阻碍了经济增长。传统的解决办法是劳方保持自律,通过提高社会整体财富来增加劳方工资,而非扩大劳方分配比例,这使其处于不确定状态。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利润虽然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但却不是改善任一集团状况的必要条件”^[19]。为降低劳方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不确定性,需要引入国家。在国家充当担保人的条件下,劳资双方促进经济增长与提高劳工物质利益的关系如下:



实现经济增长与劳工收入增加的相互促进需要哪些政治条件呢?回答该问题的最著名理论是Lange-Garrett模型。^[20]该模型认为,“劳工力量只有同时与市场与政治中发挥作用才能促进经济增长”^{[10]793}。兰格与加勒特用两个自变量来解释经济增长。变量 X_1 是工会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组织性权力,它从两个方面去操作:第一,参加工会的劳工比率;第二,工会运动的集权程度。变量 X_2 是劳工的政治权力,它主要考察左派政党在内阁中所占的比例。^[21]其模型如下:

$$\text{Growth} = b_0 + b_1 X_1 + b_2 X_2 + b_3 (X_1 \cdot X_2) + e$$

按照该模型,只有同时实现劳工的高组织性权力与掌握政治权力,才能实现经济增长。^①简表如下:

表2 政府派性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左派政党的政治权力	
	强	弱
工人运动有涵盖性	促进经济增长	阻碍经济增长
工人运动无涵盖性	阻碍经济增长	促进经济增长

Lange-Garrett模型遭到罗伯特·杰克曼(Robert Jackman)的抨击。首先,杰克曼认为劳工

①新古典经济学家通常不赞同政治学关于劳工市场的高组织程度和政府干预分配的理论,他们将集权化的工会市场权力和社会民主政府的大规模收入再分配视为是长期经济增长的阻碍。新增长经济学家虽然赞成政府政策和经济制度在促进经济增长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但是仍然主张劳工市场的分权化,反对社会民主政府。

与左派政党控制国家受到当前西方民主制的挑战,“当左派政党组成政府的时候,国家就直接掌控在劳工手中,这种观点假定存在一个多数政治制度(majoritarian political institutions)”^[22]。而这种多数政治制度几乎很少,绝大多数自由民主国家的民主制都在限制多数而保护少数。从实践来看,自由民主国家更多产生联合政府。^[23]因此,代表劳工的左派政党当选也不能控制国家。其次,杰克曼用安东尼·唐斯(Anthony Downs)的政策趋同(policy convergence)理论来说明政府难以执行工会所期待的偏左政策。在政策趋同的背景下,政党在特定问题上的观点模糊不清。^[24]因此,国家政策也就无所谓具有某种派性。

虽然 Lange-Garrett 模型遭到了批判,但是它却为西方工业国协调劳资矛盾与促进经济增长开辟了一条新路径——通过国家来保障劳工分享经济增长的实惠。从这一点来看,兰格与加勒特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政权类型与经济增长

以政权类型作为自变量来解释经济增长也是国外政治学的研究重点,学者通常将政权分为民主与威权两类。在此需要说明,笔者仅关注民主与经济增长的联系,至于威权暂不涉及。

一部分学者认为民主对经济增长将起到负面效应。由于各种利益集团试图影响政府决策以扩大再分配份额的比重^[25],结果政府规模越来越大,政府干预再分配的力度也越来越大,同时制度激励也使社会成员更愿意游说政府以影响再分配而非进行生产,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还有学者认为民主政府在选举的压力下往往采取短视措施,这导致经济增长不可持续。

另一部分学者就民主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持肯定态度,其中奥尔森最具代表性。奥尔森认为民主是大多数人的统治,进而大多数人与社会有了更大的涵盖利益,代表大多数人利益的民主政府将选择比独裁者更低的税率与规模更小的再分配,故而民主有利于经济发展。^{[8]567-576}国外大量采用不同方法的研究旨在证实民主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例如凯伦·雷默(Karen Remmer)用定量研究论证这一观点^[26];亚当·普泽沃斯基(Adam Przeworski)与费尔南多·利蒙吉(Fernando Limongi)构建了一个有关政权类型和经济关系的模型以解释选举结果。^[27]

除了竞争性选举,民主还意味着公民权利,尤其是经济自由权。一方面,经济自由能够促成企业家精神,鼓励市场活动,从而推动经济增长;另一

方面,过多经济自由可能造成围绕分配问题展开斗争,从而阻碍经济增长。国外学者主要通过前者来探讨经济自由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其中较为著名的是罗伯特·巴罗(Robert J. Barro),他认为公民自由有利于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28]

(三)政治稳定与经济增长

将政治稳定定义为暴力缺失的学者借助统计法以寻找政治稳定与经济增长间的相关性,道格拉斯·希布斯(Douglas Hibbs)发现政治不稳定不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29]也有观点认为暴力程度高将对经济增长发生负面影响。通过对政变、政治谋杀与跨国经济增长的回归分析,巴罗发现政治不稳定将阻碍经济增长^[30],伊斯特利(Easterly)与雷贝洛(Rebelo)的调查亦支持巴罗的观点。^[31]

一部分学者研究政治不稳定对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影响。例如韦尼耶斯(Venieris)与古普塔(Gupta)发现暴力程度高对储蓄率产生消极影响;^[32]本哈比卜(Ben-Habib)与施皮格尔(Spiegel)发现暴力程度越高越容易降低投资^[33];厄兹莱尔(Ozler)与塔伯里尼(Tabellini)发现政治越不稳定的国家越容易导致外债增长。^[34]

政府稳定性也是认识政治稳定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一条路径。库克曼(Cukierman)、爱德华兹(Edwards)与塔伯里尼认为政府经常改变将引发通货膨胀^[35];爱德华兹与塔伯里尼指出,不稳定的政府容易出现短期性财政政策,将不计后果地增加财政收入^[36];卡纳克(Knack)与基弗(Keefer)发现政府不稳定对投资和增长都有消极影响,此外腐败与官僚素质也同政府不稳定有关,腐败与劣质官僚将阻碍经济增长^[37];隆德雷甘(Londregan)与普尔(Poole)认为经济增长会加大政变的可能性,而持续的政变会形成惯性,但是这种惯性未必会减慢经济增长。其研究结果与阿尔佩托·阿莱西纳(Alberto Alesina)等对113个国家从1950年至1982年经济增长状况的研究发现相反,后者认为具有高度政府垮台倾向的国家的经济增长往往比其他国家差。^[38]

(四)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

政治学理论认为,收入不平等借助三条路径影响经济增长:第一条路径是寻租。资源分配不公将对低收入者参与寻租产生极大刺激,而寻租不利于投资与经济增长。^[39]若收入越不平等,则越多的人将参与非法行为,这将对财产权构成巨大威胁。^[40]雅各布·斯文森(Jakob Svensson)通过对100个国家的横向比较也发现收入分化与政治不稳定将影响财产权的保护,如果财产权得不到有效保

护将影响投资,并且经济增长也将放缓。^[41]

第二条路径是政治不稳定。其因果逻辑为收入不平等导致政治不稳定,政治不稳定阻碍经济增长。它强调收入不平等是政治不稳定的重要诱因,如果少数人掌握大多数财富,那么大多数贫困人口极有可能对现行社会经济状况不满,从而期盼激进的变革。如果收入越不平等,那么大规模暴力与非法夺权就越有可能发生。如前文所述,政治不稳定对经济增长将产生负面影响。

第三条路径是财政。在资本主义民主国家,选民偏好是政府支出与税收水平的决定因素之一。通常低收入者一方面承担较低税负,另一方面又从政府支出中获益,因此低收入选民偏向高税收政策。在收入不平等的社会中,大部分人属于低收入者,因此大部分选民更倾向高税收,这导致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增加,进而带动税收增加,这将减少私人投资的税后利润,利润减少又降低了资本积累率,从而影响经济增长。汤姆·鲁曼(Tom Romer)、凯文·罗伯茨(Kevin Roberts)、艾伦·梅尔策(Allan Meltzer)与斯科特·理查德(Scott Richard)^[42]构建了关于税率政策投票的统计模型。

三、总结

经济增长是生产扩大的结果,生产是经济活动的组成部分,而经济又内嵌于社会之中,因此经济增长的直接机制存在于社会领域。国家虽能够参与经济活动,然而经济行为、尤其是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仍依赖社会领域。这是一种经济逻辑,即国家或作为生产者与消费者出现在社会、市场之中,或动用公权力来弥补市场本身所固有的诸如合成谬误、搭便车、外部性等缺陷。

对经济增长的政治学研究沿着政策选择与政治条件两大维度展开,二者各具特色:前者以案例研究为主,后者以量化研究为主。对经济增长的政治学研究有利于将经济增长的因果机制朝政治领域推进,通过研究政策选择与政治条件,政治学做出了探寻经济增长的因果逻辑的努力。单纯考虑经济逻辑可能忽略了国家采取经济政策的动机与能力,也忽略了政治为经济运行所划定的范围,正如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所言:“除非施展权力和拥有权威的人允许,否则市场不可能在政治经济功能方面发挥主导作用”^[43]。例如学术界通常认为印度在20世纪80年代末出现经济增长的原因是自由化经济政策,然而这一解释无法回答印度的政策选择,即印度为什么保持了30多年的低效经济政策?为什么能在20世纪80年代末进行经济改革?因此,对经济增长的政治学研究加深了我们的理解。

参考文献:

- [1] SAMUEL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 [2] SEYMOUR MARTIN LIPSET. 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J].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59, 53 (1): 69-105; ROBERT W. JACKMAN. On the Rel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o Democratic Performance [J].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973, 17(3): 611-621.
- [3] PETER J. KATZENSTEIN. Corporatism and Change: Austria, Switzerland and the Politics of Industry [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 PETER J. KATZENSTEIN. Small States in World Markets:

表3 解释经济增长的政治学理论

类型	名称	代表人物	特点	缺陷
政策选择	集体选择	奥尔森	社会集团的不同策略影响经济增长	忽略国家
	理性选择	贝茨	政策选择的政治因素	分解国家、不能做预测
	统合主义	卡赞斯坦	国家与社会合作	国家与社会合作的动机不明确
	发展型国家	阿姆斯登、埃文斯、维 斯、霍布森	国家发展经济动机来源国际竞争,政商 合作,有选择地发展产业	忽略国家所面临的内部安全威胁
政治条件	政府派性	兰格、加勒特	劳工力量只有同时市场和政治中发挥 作用才能实现经济增长	左派政府具有派性观点受到质疑
	政权类型	普泽沃斯基、巴罗	经济自由有利于经济增长	相关性弱
	政治稳定	希布斯、古普塔	政治不稳定影响投资等经济活动	政治稳定概念难以形成共识性的量化 指标,相关性弱
	收入不平等	阿莱西纳、罗德里克	由收入不平等引发的不稳定和高税收阻 碍了经济增长	因果机制不确定

- Industrial Policy in Europe[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 JOHN ZYSMAN. Governments, Markets and Growth: Financial Systems and the Politics of Industrial Change [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GOSTA ESPING-ANDERSEN's. Politics Versus Markets: The Social Democratic Road to Power [M].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M. J. PIORE, C. F. SABEL. The Second Industrial Divide: Possibilities for Prosperity [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4; R. J. FLANAGAN, D. W. SOSKICE, L. ULMAN, UNIONISM. Economic Stabilization and Income Policies: European Experience [M].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0; P. GOUREVITCH, A. MARTIN, G. ROSS, C. ALLEN, S. BORNSTEIN, A. MAROKENTS. Unions and Economic Crisis: Britain, West Germany and Sweden [M].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84; R. Z. LAWRENCE. Can America Complete? [M].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84.
- [4] 谭融. 美国利益集团政治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39.
- [5] MANCUR OLSON.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 [6] MANCUR OLSON.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 [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2.
- [7] EDDIE WING YIN TANG, R. ALAN HEDLEY. Distributional Coalitions, State strength, and Economic Growth: Toward a Comprehensiv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 Public Choice, 1998, 96(3-4): 295-323.
- [8] MANCUR OLSON. Dictatorship,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J].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93, 87(3).
- [9] 赵鼎新. 集体行动、搭便车理论与形式社会学方法[J]. 社会学研究, 2006, 21(1): 1-21.
- [10] PETER LANGE, GEOFFREY GARRETT. The Politics of Growth: Strategic Interaction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Advanced Industrial Democracies, 1974-1980 [J].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1985, 47(3).
- [11] ROBERTS H. BATES. Beyond the Miracle of the Marke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grarian Development in Kenya [M].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 [12] PETER J. KATZENSTEIN. Small States in World Markets: Industrial Policy in Europe[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
- [13] DAVID LANDES. Watchmaking: A Case Study in Enterprise and Change [J]. The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1979, 53(1): 1-39.
- [14] PETER J. KATZENSTEIN. Corporatism and Change: Austria, Switzerland and the Politics of Industry [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 162.
- [15] 朱天飏. 比较政治经济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222.
- [16] CHALMERS JOHNSON. Miti and Japanese Miracle [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CHALMERS JOHNSON.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The Government-Business Relationship in Japan, South Korea, and Taiwan [M]// FREDERIC C. DEYO, e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East Asia Industrial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136-164.
- [17] 禹贞恩. 查默斯·约翰逊暨民族主义和发展政治学[M]// 禹贞恩. 发展型国家. 曹海军, 译.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 2008: 2.
- [18] ROBERT WADE. Governing the Market: Economic Theory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ast Asian Industrialization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29.
- [19] ADAM PRZEWORSKI, MICHAEL WALLERSTEIN. The Structure of Class Conflict in Democratic Capitalist Societies [J].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82, 76(2): 215-238.
- [20] GEOFFREY GARRETT, PETER LANGE. Performance in a Hostile World: Economic Growth in Capitalist Democracies, 1974-1982 [J]. World Politics, 1986, 38(4): 517-545; PETER LANGE, GEOFFREY GARRETT. The Politics of Growth Reconsidered [J].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1987, 49(1): 257-274.
- [21] DAVID R. CAMERON. Social Democracy, Corporatism, Labour Quiescence,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Economic Interest in Advanced Capitalist Society [M]// JOHN H. GOLDTHORPE, ed. Order and Conflict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4.
- [22] ROBERT JACKMAN.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Growth in the Industrial Democracies, 1974-80: Leftist Strength or North Sea Oil? [J].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1987, 49(1): 254.
- [23] 阿伦·利普哈特. 民主的模式: 36个国家的政府形式和政府绩效[M]. 陈崎,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 [24] ANTHONY DOWNS.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M].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57; BENJAMIN PAGE. Choice and Echoes in Presidential Politics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8.
- [25] ANNE KRUEGER.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Rent-Seeking Society [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4, 64 (3): 291-303; JAGDISH N. BHAGWATI. Directly Unproductive, Profit-Seeking (DUP) Activities [J].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2, 90 (5): 988-1002; DENNIS MUELLER. Public Choice

- [M]. Cambridge, U. 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 [26] KAREN REMMER.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Stabilization: IMF Programs in Latin America, 1954–1984 [J]. Comparative Politics, 1986, 19(1): 1–24; KAREN REMMER. Democracy and Economic Crisis: The Latin American Experience [J]. World Politics, 1990, 42 (3): 315–335.
- [27] ADAM PRZEWORSKI, FERNANDO LIMONGI. Political Regimes and Economic Growth [J].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3, 7 (3): 51–69; ADAM PRZEWORSKI.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Well-being in the World, 1950–1990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28] ROBERT J. BARRO. Determinants of Economic Growth: A Cross-Country Empirical Study [M].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997.
- [29] DOUGLAS HIBBS. Mass Political Violence: A Cross-Sectional Analysis [M]. New York: Wiley and Sons, 1973.
- [30] ROBERT J. BARRO. Economic Growth in Cross-Section of Countries [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1, 106(2): 407–443.
- [31] WILLIAM EASTERLY, SERGIO REBELO. Fiscal Policy and Economic Growth: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R]. Working Paper No. 4499, 1994.
- [32] YANNIS VENIERIS, DIPAK GUPTA.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Socio-Political Instability as Determinants of Savings: A Cross-Sectional Model [J].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6, 94(4): 873–883.
- [33] ALBERTO F. ALESINA, ROBERTO PEROTTI. Income Distribution, Political Instability, and Investment [R]. NBER Working Paper No. W4486, 1993.
- [34] SULE OZLER, DANI RODRIK. External Debt and Political Instability [R]. Working Paper No. 3772, 1991.
- [35] ALEX CUKIERMAN, SEBASTIAN EDWARDS, GUIDO TABELLINI. Seigniorage and Political Instability [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2, 82(3): 537–555.
- [36] SEBASTIAN EDWARDS, GUIDO TABELLINI. Political Instability, Political Weakness, and Inflation: An Empirical Analysis [M]//CHRISTOPHER A. Sims eds. Advances in Econometrics: Sixth World Congres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 [37] STEPHEN KNACK, PHILIP KEEFER.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ross-Country Tests Using Alternative Institutional Measures [M]//STEPHEN F. KNACK eds. Democracy, Governance, and Growth.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3: 56–77.
- [38] ALBERTO ALESINA¹, SULE ÖZLER, NOURIEL ROUBINI, PHILLIP SWAGEL. Political instabi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J].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1996, 1(2): 189–211.
- [39] JESS BENHABIB, ALDO RUSTICHINI. Social Conflict, Growth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EB/OL]. http://www.mpls.frb.org/Research/events/1991_08_02/Benh Habib_SocialConflict.pdf; JESS BENHABIB, ALDO RUSTICHINI. Social conflict and growth [J].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1996, 1(1): 125–142.
- [40] MARIANNE FAY. Illegal Activities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A Model with Envy [R]. Columbia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1993.
- [41] JAKOB SVENSSON. Investment, property rights and political instability: Theory and evidence [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998, 42(7): 1317–1341.
- [42] TOM ROMER. Individual Welfare, Majority Voting, and the Properties of a Linear Income Tax [J]. The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975, 4 (2): 163–185; KEVIN W. S. ROBERTS. Voting over Income Tax Schedules [J]. The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977, 8 (3): 329–340; ALLAN H. MELTZER, SCOTT F. RICHARD. Tests of a Rational Theory of the Size of Government [J]. Public Choice, 1983, 41 (3): 403–418; ALLAN H. MELTZER, SCOTT F. RICHARD. A Rational Theory of the Size of Government [J].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1, 89(5): 914–927.
- [43] 苏珊·斯特兰奇. 国家与市场 [M]. 杨宇光等,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19.

(责任编辑 张 勇)

Abstract Although the research on economic growth is one of important issues of social sciences and in particular economics, there are related theories in political science to explain economic growth. By a literature analysis, this paper sorts out those theories of political science on economic growth from the two dimensions of policy choice; political conditions and classifies and summarizes these views. Further,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some thoughts on research patterns of political science on economic growth.

Key words economic growth; policy choice; political conditions